第13卷 第2期　　植物分类学报　　1975年4月

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

胡世林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LI SHIH-CHÊN AND HIS «PEN TS'AO KANG MU»

Hu Shih-lin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本草纲目》是十六世纪我国进步的医药科学家李时珍的一部名著。李时珍生活在明朝中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儒法斗争非常激烈的年代。他的思想、实践活动和著作必然要打上阶级的烙印，表现出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因此，研究李时珍在科学上取得成就的原因，分析儒法斗争对于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的影响，对于弄清是谁创造了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是谁阻碍破坏了医药科学的发展，在批林批孔继续朝着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人民是创造我国医药学的主人

李时珍之所以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一位科学家，首先他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防病治病的实践。他行医、采药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城乡渔村、矿山作坊、深山密林，都是李时珍进行调查采访的场所，大自然和社会生活，就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验室。李时珍一生的活动和《本草纲目》全书，闪耀着劳动人民创造医药学的智慧和光芒。

李时珍所走过的是一条实践出真知的道路。在儒学盛行、科举禁锢的时代，他早年几次没有考取举人，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弃儒为医，中年又毅然辞官不做，接近劳动人民，致力于医药事业，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的否定。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李时珍没有乞求于统治阶级，而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学生和子孙，更重要的靠千百万劳动群众，完成一部一百九十多万字的巨著。恩格斯在谈到科学家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们"**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李时珍正是站在劳动人民方面，为寻求医药科学的真理而进行斗争的。正因为如此，李时珍才有可能根据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用群众的生动语言来总结、记载药物的准确疗效。正如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所高度赞扬的那样：《本草纲目》"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

《本草纲目》记载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其中经过李时珍发现、总结民间经验新增的药有三百七十四种。"三七"这种药，是李时珍首先给予详细描写和正确地总结的。据《本

草纲目》记载,“三七”产于广西的深山里,群众用它治疗跌打损伤,军队中用它治疗刀剑创伤。李时珍肯定了“三七”的性味、功能,并且说这种药味“微甘而苦”,和人参有些相似。我们知道,人参和“三七”是同科同属植物,都含有皂甙一类化学成分。李时珍只有亲自尝过“三七”的滋味,才有可能作出这样准确的记载。“金银花”是现在人们很熟悉的药物,也是李时珍在实际观察其花由白变黄的过程时,首次记载了“金银花”这个民间的称呼。他写道:“花初开者蕊瓣俱白色,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气甚芬芳,四月采花,阴干。”这段描写不论从植物学角度还是从药物学的角度来衡量,无疑都是科学的。并且指出可以清热解毒,这与现代科学实验有抗菌消炎作用的结果是一致的。为了证实风茄花的麻醉作用,李时珍亲自作试验,并且用它作一些外科手术的麻醉剂,使中药麻醉方法得到延续。这种药的麻醉镇痛作用,现已为我国医务工作者的临床和药理研究所证实。可见,实践是医药科学的唯一源泉。

总而言之,《本草纲目》的编写告诉人们,药物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劳动人民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医药科学真正的主人。

《本草纲目》的成就是朴素唯物主义在科学史上的胜利

李时珍对于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医学上,他首先提出脑为机体活动主宰的见解;在药剂上他记载了蒸馏、升华、重结晶、水浴加热等制药方法;在毒物学方面,他首先记载开采铅汞时所引起的职业中毒和一氧化碳(煤气)中毒;在地质学上他第一次记载了粪化石;在生物学上他也已经提出了进化的思想。

李时珍在科学上作出卓越成就的原因,主要是他在实践中逐步地掌握和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一思想武器的结果。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唯物的,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变化的,各有其规律,有常有变,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是无穷尽的。如李时珍说:“是故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物为迂怪耶?”在谈到“金银花”的应用时,李时珍说过:“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辙论也。”他对自然界的云、雨、雷、电也作过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充分反映了李时珍不拘于古人,敢于变革的精神。

在医药方面,李时珍指出:用一个药方通治百病是骗人的。他主张辩证论治,在医疗上反对先入为主、千篇一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对有毒药物,他既看到有毒的一面,又看到使用得当可以治病的一面。

李时珍是历史上坚持医药结合的典范,他十分重视药物的效用,在纲目凡例中就说过这样的话:“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由于有这种思想的指导,才使他收集各种附方达一万一千多个,在“黄连”一药之下,附方竟有62个之多。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

李时珍在他编写《本草纲目》时,参考了八百多本各类古书。但是,他研究古书并不是为了好古、尊古,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采其精粹”、“正其谬误”、“是非有归也”。这种对前人的著作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是十分可贵的。他还认为后人应该并且可以超越前人。在《本草纲目》中,他专列有“发明”和“正误”项目,记载当时人民群众和他自己对药物品种、功效的新发现、新见解,纠正前人的错误。这就是他主张前进、主张革新的具体表

现。

李时珍主张前进和革新的思想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药物分类的改革上。他不拘泥于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试图从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进程来对药物进行比较科学的分类，勾画了一个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线索。在书中公开声明他的分类方法是“从微至巨，从贱到贵。”这里所说的贵贱是指高低而言。例如，过去龙被视为神物，是天子的象征，而李时珍把它列在鳞部，处于较凤、猩猩为低的地位。部类以下的植物，李时珍也注意到把相近的种类放在一起。例如，列当科的列当、肉苁蓉、锁阳是紧挨着的；萆薢、菝葜、土茯苓等百合科菝葜属植物也是排在一起的。李时珍这种分类方法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也说明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论者。同时李时珍还觉察到生物的变异现象，而且认为可以用人工方法来影响这种变异，例如，野象的驯化，金鱼颜色的变化，在《本草纲目》中都有实录。我们知道，欧洲直到 18 世纪还处于“物种不变论”和“神创论”的统治之下，1735 年林奈发表的《自然系统》，把植物分为二部二十四纲。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一千零九十四种植物分为五部三十类。在时间上不仅要比林奈早一百多年，而且内容也比林奈的《自然系统》丰富得多。可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却大肆贩卖什么“欧洲文化中心论”的黑货，这只能暴露林彪卖国贼的嘴脸。

十六世纪初年，即比李时珍仅早几十年的时候，明朝统治者也曾经编修一部本草，名叫《御制本草品汇精要》。由于受到儒家反动思想的束缚，受到“宿命论”和“历史退化论”的严重影响，因循守旧，甚至把司马光的死党邵雍编的《皇极经世书》这类荒谬绝伦的儒家书籍中的唯心主义分类方法，也引进了药物学的领域。以草部分类为例，这本书就分为草之草，草之木，草之飞，草之走，完全违背植物的生态习性规律，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在分类学上的突出表现。而李时珍则不然，他把草部药物分为山草、芳草、隰草、水草、蔓草、毒草，比较接近于科学的分类。这是李时珍作出的独创性的贡献。

以上对照，充分说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医药科学发展的决定因素。李时珍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攀登了他那个时代的医药学高峰，并不是因为他是“天才”，而是他参加实践，依靠人民的结果，是朴素唯物主义在科学史上的胜利。

儒法斗争对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影响

李时珍生于 1518 年，死在 1593 年。这个时期，正是明朝封建社会危机加深的时候。他经历了官僚大地主阶级顽固派推行儒家路线和封建社会末期法家代表人物张居正执政的两个阶段。张居正执政的十余年间，正是《本草纲目》成书的关键时刻，张居正在当时农民起义和市民斗争的影响下，举起了法家的旗帜，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理论，批判孟轲“法先王”，高度肯定荀况的“法后王”。这对李时珍“人定胜天”思想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张居正在政治上积极主张变法革新，推行法治，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抵御倭寇骚扰，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得以安定。这对于李时珍后期的采药、调查、编写等活动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商业和贸易的发达，也使李时珍有机会研究更多的外来药物。

在李时珍一生的活动中，明显地表现了尊法反儒的倾向。在他所参考过的经史书籍中，有历史上重要的法家和科学家如王充、祖冲之、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和沈括等人的著作。更主要的是通过实践活动，他感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很多的，因此他说：“物

理万殊若此，学者其可不致知乎。”“物之性理万殊，人之用舍宜慎”。而且进一步指出“格物无穷”，这些观点，都是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有力批判。正因为如此，他把不深入实际，妄下结论的人斥责为“未深加体审，唯据纸上猜度而已”。指出这种恶劣的学风是“浅学立异误世，鄙人据以为谈”。可见其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深恶痛绝。他还继承了荀况“人定胜天”的哲学思想，在大量的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发现人的力量是伟大的，药物的升降浮沉的性能，是可以用人力来改造的，所以他说：“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既指出了药物性能自有其物质基础，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加以改变，关键在于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即他所谓的“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就是说，你不了解药物固有性能，你就不能对它进行改造。这也是李时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他从历史上法家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武器，同时，又以自然科学上的见解，论证和支持了法家的前进革新的观点。

李时珍还曾用亲身实践得来的知识批判儒家。例如，有人问孔老二一种植物，孔老二胡诌说是“萍实”，后来的儒生，以此吹捧孔老二“博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孔老二说的“萍实”就是“萍蓬草”。“萍实”这个名称，易误解为浮萍的果实而未加采用。这与他同时代的法家杰出思想家李贽所提出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反儒精神是相通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用许多篇幅来叙述种药的土壤选择、播种、施肥、灌溉和采收等经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和他自己生产实践的结晶。也是对孔老二鄙视体力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等反动思想的有力批判。

李时珍批判了王阳明宣扬的唯心主义的“心学”。王阳明在竹子面前静坐了七天，说是得不出竹子生长的规律，于是，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整套极端唯心主义的反动理论。而李时珍，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对竹子长期观察，深入调查，正确地描述了竹子由笋成竹，开花结实的过程，记述十几种竹，并说明了竹子的用途和经济价值。这是对王阳明“心学”的否定。

明朝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昏庸无能，妄想服丹药长生成仙，永远当统治者，结果中毒身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根据历代帝王等人服丹药而死的事实，尖锐地指出“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这是对这些愚蠢皇帝的不指名的批判。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李时珍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影响。而有时也还宣扬儒家的“天命观”，如说什么“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因而使他陷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之中。他一方面批判“草子变鱼”的自生说，一方面又相信“烂灰为蝇”“腐草为萤”的谬论；一方面斥责迷信鬼神为邪说，一方面又提倡古镜可以避邪魅。也就是说，在他的朴素的唯物论的认识论中，也还掺杂了不少唯心主义的观点，还不自觉地宣扬了某些儒家的观点。这是我们在吸收《本草纲目》精华的同时，必须加以批判的。

《本草纲目》问世以后，历代中外进步的学者，都认为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称赞它是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的好书，是中国古代的医药学百科全书，也是人民需要的一部好书。它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对国外也有较大的影响。从十七世纪初，就陆续被译成英、德、法、日、俄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这对世界的医药学和植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那些复古尊儒的人，却诋毁它的价值。历代反动统治者还阻碍了这部书的传播。这些都说明了儒家路线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干扰和破坏。

《本草纲目》的写作、出版和流传的历史有力地说明，医药学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法家进步革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对我国医药学和植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李时珍能够在科学上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就是因为他和“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决裂，重视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亲身参加实践的结果。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宣扬“儒家是我国文化的来源”的反动观点，必须彻底批判，并肃清其流毒。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研究儒法斗争对我国医药学和植物学发展的影响，总结劳动人民创造祖国医药学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为创造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而奋斗。